

列宁论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一九七五年八月

说 明

我们从《列宁全集》第4版中译本，《列宁论图书馆工作》（Что писал и говорил ленин о библиотеках·克鲁普斯卡娅著，李哲民译，1957年，时代）中译本以及《列宁论图书馆事业》（Ленин о библиотечном деле·1960年，莫斯科）俄文本三种书中，汇集了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文、演说、书信、签署和修改过的文件、意见等等共60多篇，克鲁普斯卡娅的论文5篇，题为《列宁论图书馆》，供图书馆学专业学员学习之用。

本书采用逐年按著作日期（或发表日期）先后为序的办法排列材料。译文根据《列宁全集》第4版中译本或《列宁论图书馆工作》中译本等等。我们自己也翻译了一小部分，由于水平不高，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很多，请同志们指正。若要引用，务请核对原文。再者，译文来源不同，译名互不一致，为了尊重原译者的译法，我们没有做统一译名的工作。

《列宁论图书馆》编译小组

1975年8月

目 录

1905年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
-----------------	---

1908年

给玛·费·安得列也娃	8
------------------	---

1912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摘录）	9
--------------------------------------	---

1913年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	10
--------------------	----

1914年

书评 “1913年圣彼得堡全俄卫生展览会陈列的关于劳动保护问题的资料”	13
书评 尼·亚·鲁巴金编“书林概述”	14
参考书目	17

1917年

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	32
---------------------	----

1918年

关于移交参考文库的指令	34
人民委员会决议摘录 (1918年 4 月26日)	34
关于建立图书馆事业	35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彼得堡图书馆处的电报	35
人民委员会关于保护图书馆和书库的法令	36
人民委员会关于征收图书馆、书库和一般书籍的手续的法令	37
关于 П. И. 苏尔科夫的图书馆	38

1919年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处处长库得连夫采夫的电报	40
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919年 1 月14日)	40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41
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919年 1 月30日)	42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43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45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科学图书馆的决议草案所作的修改和补充	49
给瓦·瓦·沃洛夫斯基	50
同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来往便函	51

1920年

给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的便函	52
人民委员会决议	52
人民委员会关于储存的书籍和其它印刷品国有化的法令	53
人民委员会关于登记彼得格勒存书条例的法令	54
人民委员会关于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书目 工作交由国家出版局管理的法令	54
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各共和国图书馆事业集中化”的命令草	

案	56
给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	59
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命令	60
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共和国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法令	61
生产宣传提纲（草稿）摘录	64
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便函	66

1921年

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信（摘录）	67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摘录）	68
给秘书的指示	68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M·H·波克罗夫斯基的便函	69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69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80
送到国立出版社	81
致利特肯斯同志的信	82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摘录）	83
给密席略柯夫同志的便函	85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演说（摘 录）	86
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来信上的批示	88
给外文图书委员会的信	89
关于利用白匪军书籍的询问	90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91
希望得到德国出版的书籍	92
给中央出版总署、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出版部、农业人民委员 部、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便函	93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通告摘录	93
给 H·Π·高尔布诺夫的便函	94
人民委员会关于非定期刊物收费的法令	94

人民委员会关于实施报纸收费的法令	96
给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分发文件的便函	97
向A·B·卢那察尔斯基, M·H·波克罗夫斯基, E·A·利 特肯斯的询问	97

1922年

伊·伊·斯切潘诺夫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	99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	101

1923年

论合作制(摘录)	102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为“列宁论图书馆工作”初版所写的 序言	103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为“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第二版所写 的序言	106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为“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第三版所写 的序言	108
列宁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	110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	119

1905年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905年11月13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我们内阁总理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①还是“非法地”出版的，但是，这种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它们

①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从1905年10月17日（30日）至12月14日（27日）出版，该报是报道苏维埃活动的通报。该报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用超越常规的方式，在各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中印刷。共出了10号。第11号在印刷的时候即被警察没收。

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它“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含糊其词的话，这种话同那些还没有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员的人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沒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骂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①，仍然被摈斥在专制的警察俄国的大门之外。

①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党中央全会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通过决定，任命列宁为中央机关报的主编。“无产者报”于1905年5月14日（27日）至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经常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无产者报”继续贯彻列宁的旧“火星报”的路线，并且完全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传统。列宁为该报共写了5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刊登的列宁的文章都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

在各地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转载，出版过单行本。

在列宁回国不久，“无产者报”于1905年11月停刊了。最后两期（第25、26号）是由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辑出版的。

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活水，注入这一切工作中，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检查制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而且我们一定创办自由的报刊，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

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们按得票的多少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合或者分离。党是自愿结合的团体，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为了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应该按照党纲，按照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按照各国社会民主党、各国无产阶级自愿结合的团体的全部经验，这些党和团体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也同样经常按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将要这样做。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所说的绝对自由都是假的。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春宫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块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最卓越的革命思想，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情况，使它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29页。

• 《列宁全集》指《列宁全集》第4版中译本，下同。

1908年

给瑪·费·安得列也娃

亲爱的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寄上我们图书馆馆员给阿·马·的信。

事情是这样。我请求阿·马·给俄国各报纸写一封合法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寄来一些革命时代的报纸和有关革命历史的材料，以便帮助日内瓦的库克林^①图书馆。

这封短信向广大读者说明，帮助这个图书馆对于高尔基本人以及他所熟悉的其他许多著作家的工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请您设法把这封信用胶版印出来（希望季诺维·阿列克谢也维奇^②不要拒绝协助），并寄给方针比较好的俄国各报章杂志。

这一切工作请您设法安排一下！

请那位季诺维·阿列克谢也维奇把维克多没有拿走的书（如果娜塔利亚·波格丹诺夫娜也没有拿走的话）用平信寄来。

紧紧握手。

祝五一节好！

您的列宁

写于1908年4月底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47页。

① 格·阿·库克林是社会民主党人，侨民，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出版人，自1901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党“生活派”的成员；1905年靠拢布尔什维克，创办了大型革命图书馆。库克林在日内瓦筹办的革命图书馆自1902年开放。在1907年7月库克林逝世以后，根据他的遗嘱该图书馆归布尔什维克所有。

当时在日内瓦库克林图书馆任馆员的维·阿·卡尔宾斯基的信没有找到。

② 季·阿·彼什科夫是阿·马·高尔基的养子。

1912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摘录)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

.....

(3) 必须使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阅览室、图书馆、各种工人文娱团体等合法团体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推广工会出版的报刊，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工会报刊；利用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演说；从工人中培养合法的演说家；成立(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工人和其他的区、街道选举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城市自治机关时进行鼓动，等等；

.....

(5) 最好吸收宣传小组参加日常实际工作：散发秘密社会民主党书刊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等等；

(6) 要知道，进行经常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书报鼓动，特别是经常散发定期发行的秘密党报，对建立秘密支部之间以及合法工人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之间的组织上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46—447页。

1913年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①

(1913年7月18日)

西方国家有不少迂腐的偏见，在我们神圣的祖国俄国是没有的。例如，那里的人们认为，藏书几十万或几百万册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决不当成为只供少数学者或所谓学者利

-
- ① 本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革命前（1913年）写的，发表在“工人真理报”上。当时俄国工人运动正走向高潮，列宁移居到高俄国较近的克拉柯夫城，他每天写文章在扩大了工人刊物——“真理报”上发表；那时，他不断地与俄国工人们和第四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保持接触。当时他特别注意人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给我们的代表们写讲演稿，并曾把这些论文发表在“真理报”上。他的关于国民教育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他为巴达耶夫同志写了“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的报告；他写的有关文化、国民教育、学校方面的问题的论文有：“俄罗斯人和黑人”、“增长着的矛盾”、“农民经济中的儿童劳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犹太学校的民族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论文里指出了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在许多论文里把美国在进行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国内战争以后所取得的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同沙皇俄国的文化加以对比。他在图书馆事业方面也做了同样的对比，指出在沙皇制度下，“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可能做的。——恩·克鲁普斯卡娅。

用的财富。那里的人们抱着一种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和荒谬的目的：要使这些巨大的图书馆不仅对学者和教授等开放，而且也對一般群众和市民开放。

请看，这是多么不尊重图书馆事业，多么缺乏那种值得我们骄傲的“制度”！他们所注意的并不是经过好几个官僚组织讨论和制定的章程，以及规定几百条利用图书的手续和限制，而是使大量成套的图书连儿童也能利用；他们关心的是使读者能够在自己家里阅读公家的图书。他们认为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图书馆……这就是西方各国所流行的奇怪的偏见。而我们的管理当局却处心积虑地使我们不受这些偏见的影响，使我们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同一般群众和市民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庆幸了！

我手边有一份纽约公共图书馆1911年的工作报告。

在这一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从两所旧房子迁到该市新建的一座大厦。现在藏书总数将近200万册。有这样的事情：阅览室的读者借去的第一本书是俄文版的。这本书是尼·格罗特的著作：“我们时代的道德标准”。借书单是上午9时8分送去的，读者在9时15分就拿到书了。

一年之内，来过该图书馆的有1658376人。到阅览室阅读的有246950人，借阅图书达911891册。

但该图书馆图书的流通部分还不算大。能够来该图书馆的人还不够多。衡量教育工作是否安排得合理，要看有多少书被读者借回家去，对大多数居民提供了什么方便条件。